

王元化主編

徐梵澄●著

# 陸王學述

一系精神哲學

II

學術集林叢書

85

上海遠東出版社

# 陸王學述

一系精神哲學

王元化主編  
學術集林叢書

II

徐梵澄●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沪) 新登字114号

**陆王学述**

——一系精神哲学

徐梵澄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7 字数140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13-003-9/B·22 定价: 11.00元

## 出版說明

關於出學術書困難的議論，已經有些時日了。我們列身出版之業，雖知個中種種并非虛言，然深感對於學術文化的積累與發展有着一種責任，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這種責任感，促成了“學術集林叢書”的出版。

叢書的作者，既有國內的學界前輩，又有海外的華人學者；有已故的，也有正當盛年者。治學方法與著述風格，各有千秋；一家之言與價值取向，亦各有所屬。叢書出版，供學苑比較研究。

熱忱希望我們的想法能得到學術界的支持，不斷充實本叢書的行列。

上海遠東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治此一古學譬如開礦。入山開採，必須辨明礦脈。——古已有學案、傳記等，記載其淵源所自，及傳授分流。因時在近古，史事明白，容易處理。然後採集，加以冶煉，去其渣滓；即是揀選其不與時代精神尤其是科學方法相違的，視其對今世及後世有何裨益，將其採納，表揚，或存置，擱下。然存置或擱下，亦不是將其毀滅，因為倘其中有些真理的東西，終歸是毀滅不掉的。現今許多不合時宜的事物，我們只合將其保存給後人，毀之可惜。將來也許在廢料中，又可提煉出其他物品，作新的用途。

—— 徐梵澄

學術集林叢書

存齋隨筆 熊十力著

陸王學述

——一系精神哲學

徐梵澄著

錢穆與中國文化 余英時著

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

殷海光、林毓生著

# 目 录

一	小 引	1
二	定 名	4
三	精神哲学的建立	11
四	为何与如何	16
五	朱、陆并尊	22
六	陆学非禅	30
七	论学之诗	40
八	所立卓尔	44
九	非禅之悟	53
十	姚江之成学	66
十一	居夷处困	71
十二	儒将事功	76
十三	先知与彻悟	80

十四	知行合一 .....	95
十五	教言摘录 .....	103
十六	王、湛新学 .....	141
十七	王、罗论学 .....	154
十八	陆、王被攻击 .....	174
十九	戴东原攻击程、朱, 牵连陆、王 .....	195
二十	后 序 .....	216



# 一 小 引

久矣，哲学家只说自己的语言。往往不治其哲学的人，便不能懂。这似乎是事理之必然。人不能扳下一高深理义，如物理学上的，使人人皆懂。“没有皇王之路达到数学”，这是古希腊之名言。所谓其自己的语言者，便是有所运用的许多专门名词或术语，在物理、或数学、或化学等，便是许多符号和公式。其实皆是人智之所及，倘加以学习，弄清楚了那些名相，纵或艰深，终于不会有什么不能懂的。

专说自己的语言，一般很难使其学大众化。这是一弱点。在现代中国，西洋哲学介入了，涌进许多新名词，尤其是音译，在普通人确实感觉困难。直到近一二十年，方渐渐稍趋一致，大多标准化了，虽其正确性还颇有可商讨之余地；必颇明通其源出之西文，——大多是拉丁或希腊文，——方易明了。“皇王之路”或是

易行或是愉快之路，必是大众皆乐于行走的，而专门学术不必如此。“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于此论早有答覆。<sup>①</sup>

高深之学难于大众化，是一弱点，这便引起另一事实，即不易传世。所谓曲高和寡，《广陵散》自嵇叔夜一死，便永远失传。然现在所处理的这宗古学，内容不是不高深，优美，在古代不是不普遍，从宋代流传至今，未尝断绝，只是如今有断绝的趋势了。姑断自马一浮止，可推为迄今最后一宋学大师。马氏之后，尚未闻有专于宋明理学之大师出现。然则正在这“绝续之交”点，重温此一理学，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必然是要有于此学身体力行的人物，走出了其书院或学院，说出平民大众皆可了解的话，然后对社会有影响。于今看宋明儒者的语录和文章，有时真如看集句，所集者多是取自四子书，在古人是容易了解的，因为科举时代，以四书为取仕之通途，是人人所熟读的，现代不然了，普通人罕读四书、五经，因此不甚了解，由此也不能欣赏。这是主要困难之所在。其次，是现代社会比古代复杂化了，进步了，科学发达了，许多学理成了古董，废置了。那么，纵使了解，也不能珍重，只觉其无谓。再其次，现代物质方面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麻烦。空间的距离已大大缩小，而时间的迫促也大大增加。我们没有古人的生活上的简朴，也没有那种生活上的余

---

①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尽心章句下》）

闲。很少人能“张拱徐趋”，悠然乐道；玩味那些格言、简语。

凡此，皆不是真正的困难。如现代普通话说，请学者走出“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为大众说教，不是怎样的困难事。明代许多讲学家，便是这么作的。打着旗帜，扬其标语，从一处走到一处，历乡村城市，到处向群众说教。而没有四书五经的根柢，这困难也易于克服的，取而研究之便是。西洋有学者，于中国之经、史，可谓毫无根柢，然其研究中国之学，一提起便头头是道。生活太忙也不成为理由，在开始便计划去用多少年时间，则总可有其结果的。——真所谓困难者，在着实见道。这是讲学家的通病。终其身于思智中转，在语言文字中求；结果，其造诣臻极到朱晦庵而止。到晚年难免生悔。虽然，这不成为根本弃置此学的理由。

稍从正极方面说：近古以来，真所谓中国本土的哲学，只有这一套最觉声弘实大。远承孔、孟，是儒宗的精粹思想。仅举一例，可想大概：如晦庵说《通书》，谓“周子《通书》，本号《易通》，与《太极图说》并出程氏，以传于世。而其为说实相表里。大抵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纲纪道体之精微，决道义、文辞、利禄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顾其宏纲大用，既非秦汉以来诸儒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窥也。……”——此学始于周子，所以朱子如此加以赞扬。若细分析此说，仍有可讨论者在。但大体这些说法是从历史潮流阐明了宋初的风尚及其后为学之定向，是相当真切的。——即今观之，宋明理学，实卓立于世界，从之我们可以认识自己。

## 二 定 名

我们通常名此古学曰宋、明理学。于此当研讨一下。汉、宋对言，则简称宋学。但由宋、元至明，学统一贯，主旨内容皆不甚相远。于宋尚有学派之纷歧，于明则虽亦纷纷错出，然主旨之歧异甚少。此黄宗羲所以不草《明儒学案表》之故；于宋，则表列其系统条然。明代讲学家宗旨多，只多口号之异，内容少出入。宋以前呢？——答覆这问题是要追寻全部古代思想史了。——大致秦灭而后，持世教而领导每时代的主要思想，仍在经学，即孔门之经。汉人传经，“守家法，重师承”，仍是孔学。魏、晋、南北朝虽崇尚老、庄，然经学犹在，所谓“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仍多是在三礼、三传中用功夫。唐重诗赋，很少独创卓出之思想可言。韩愈、李翱之流，仍是传承孔、孟思想。就全部历史以观，宋五子之流，远不如晚周诸子，因为晚周诸子，各自有独创之原始思想，其时正值“百家争鸣”，不囿于孔、孟。宋儒则

以复兴孔、孟思想为主，自许其为千二三百年来已断之“道统”的继续。其断，断自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时当宋世，承残唐五季丧乱之余，古之儒家，有此一复古运动。由此一直发展下来了，所以就时代而言，简称“宋学”。

治国学者，尤其是西洋人之治“中国学”(Sinology)者，总感觉有此困难，即同一对象而有多名。即如人物，同一人可有多名。如朱熹，当时学界称之为晦翁，因他字元晦，一字仲晦。死后谥“文”，遂称文公。又称考亭，以讲学之地而尊称。又称紫阳，以其书室之名而名之。追封徽国，则称徽国文公，亦简称徽国。而朱子自己也有笔名，曰空同道士邹旸，——一人而有九名，乃西方所未有。如是，同此一学也，也有多名。最显著的曰“心学”。心字涵义极广，在宗教中(是否可说上一切宗教)，如儒与道与释的内涵，举不外是。唯心论与唯物论之分，姑且不说，因为在此讨论起来，会不免弥漫泛滥之失，当别论。宋儒又自诩为“身、心、性、命之学”，即以此四者为主题，分析人生，从而致其修为，以“变化气质”……等。又称理学，因为这是义理之学。而“心即理也”。至今社会俗语，仍言“天理良心”。大程子尝说“天理”二字是他自己体认出来，即修为之所独见。伊川也说：“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又说：“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或者，可另取一更简单之说：“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总之心学、理学同是一物。这是宋人的定义。

抑又有不止于此者。元修宋史，立《道学传》之名，将宋五子等列入其中，而先于《儒林传》。那么，将“道”与“理”联上了，如今

之常语曰“道理”。此道即孔、孟之道，即“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道。至后又推而广之，以谓道与学为一。“舍道则非学，舍学则非道。故学道爱人，圣师以为训，倡明道学，先贤以自任，未尝歧为二焉。”<sup>①</sup>实际三教各有其道，且各自许为“正”道，不同于己者谓之“异端”或“外道”或“邪道”。只是立场不同。然讲道学，则为儒门所专，释与老皆不称道学。似乎到清初“道学”已不被尊重了。实际上明末一班道学家也自有其弱点，孔、孟之学也成为清谈，貶讥社会。顾亭林当时愤慨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旧学理失去了生动力，所存留者是形式。当易姓换代之际，时潮是一反过去之风尚，而汉学起。故有“道学起而儒林衰，性理兴而曲台绝”<sup>②</sup>之评。这亦是历史事实。这立刻牵连到汉学、宋学之争的问题，兹不论。

如是；三名词所表者为同此一学，这是历史事实。但现代一个新世纪且将开始，人类文明已大大进步，科学已发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西方哲学已大量传译入华，我们有将此一宗古学检讨一番的必要了。必须用新眼光、新权度加以衡量。因为从古那班学者，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自许的。

今世治西洋近代哲学者，倘拈起“此学”来，便不免生起疑惑：根本这是否可称为哲学？——究之哲学一名词不古，中国古有称哲人，哲夫，哲妇……等，从来未曾有立所谓“哲学”一名词者。它是从西方介入的一词。诚然，此学已出到了纯思辨范围之

---

① 李心传：《道命录·序》。

② 语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序》，下句义为古礼制之不讲。

外，未尝有形式逻辑或因明。而逻辑或因明，究竟范围有限，不足以弥纶宇宙间之真理。而且，人生可喻说是球面的，非是一直线或单方程的，非一公式或三支五支之量所可笼络。实际我们的寻常生活便不全是逻辑的。然而在此古学中，也有彝伦之说，有伦有序，有彝有型。即使用逻辑绳之，也看不出有何纰缪，然其立义粘柔且活泼多了。反过来说，从此一学翻成西文，舍哲学(philosophy)一名词而外，亦寻不出恰当的称呼。

其次，有一中西皆颇合然稍嫌空泛的名称，即“形而上学”(metaphysics)。此词在希腊原文，亦无其他深义，指其在物理学之“上”或之“外”而编为一部之学而已。译名却正对。《周易系辞上传》云：“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许是严复创立此译名。这又似乎是心与物之对待了。——此一“物”便是《大学》中“致知在格物”之物，亦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之解，到南宋陆游，已记其有十八家，然未出其名。今时我们也可举出显著的好几家，然似乎尚无人考出这十八之数，想来大半也是失传了。但宋儒很少承认道与器对立。或将心与物划分。有云：“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无形，舍器将安适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昧者离器于道，以为非道遗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sup>①</sup>——总之，今古语文时有变化，中外皆然。同一字在古有善义，在后世可变为不善义，相反亦然。《大学》中之物，与今之唯物论中之物，难说为同一。“上下”古训亦为“前后”。不知怎样，在近年“形而上”变为玄虚以及虚伪的意思

---

<sup>①</sup> 薛季宣答陈同甫，见《艮斋浪语集》。

了。这是俗语中可矫正的。形而上学又牵涉到玄学，玄学一名词却未变，玄学属道家，盛于魏晋，则不可与此宋、明儒学同日而语。

说及“形而上”、“形而下”之学，便宜有上学、下学之分了。西方——古印度韦檀多时代——诚有上学、下学之分，但我国古代未尝有此区辨。相类者，却有内学、外学之别。这分别自东汉时已立，“东都诸儒，以七纬为内学，六经为外学”<sup>①</sup>。图讖盛于东汉，因为光武是依讖纬而起义的，那界划亦自是分明。然后世纬学未尝发达而经学盛大，这界划渐为人所遗弃了，而“内学”一名遂为佛学所专。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有其“支那内学院”之建立，欧阳氏是由儒入释，这名称是他所采用的，似乎未尝不有深意存乎其间。握住此一要义，则远非称之为“中国佛学院”之泛，且拔出流俗了。禅师家也有“房内人”之称谓，是指同见解同证悟之人，这恰好与今之口语“门外汉”相对。宋、明诸儒皆重内心修为，但不称为“内学”。姑以其根柢之《大学》言之，则其八目中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姑可曰皆为内心之事，而其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皆根于内心，然由己及人，由近及远，亦可称为外学了。现代精神修为之士，也多分内中和外在，各自成说，没有《大学》的这一系统。宋儒自诩为“内圣外王”之学，功夫是内外交

① 《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四》卷五十三，胡三省注。“学”在印度古世称“明”，一为“上明”，即由之悟入“不变灭者”之学。“下明”乃四《韦陀》，声明，仪礼，文法，文字学，诗学，天文学。（参拙译《五十奥义书》初版第688页）宋人也就“下学而上达”一语有所讨论，涉及“小学”之洒扫应对进退诸事。但没有学术上的“上学”“下学”对举。



修，先内圣然后外王，有其本末、次第。

此一圣学，近人以其内涵有多处与欧洲人文主义相合，又指为中国的人文主义。欧洲的人文主义，是越过千余年，要摆脱中世纪的愚昧和对上帝的信仰以及附着滋生的迷信的种种束缚，而恢复到古希腊的理智时代。此则有同于宋儒之复古。然宋明儒者，取材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sup>①</sup>，其志度之高大与广远，远非欧洲人文主义者所可及。然过度着重了“人”，忽略了物，只助成伦理学的建立，而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其御物的态度，王船山曾说得很明白：“圣人只做得人分上事。人分上事便是己分上事也。《中庸》言‘尽物之性’，也只是物之与人相干涉者，索与他知明处当。使其有可效于人者无不效，而其不可乱夫人者无或乱也。若天际孤鸿，江干小草，既不效于人，而亦无能相乱。须一刀割断，立个大界限，毋使彼侵此陵，失其人纪。”<sup>②</sup>又谓：“所谓‘天地之间’者，只是有人物的去处。上而碧落，下而黄泉，原不在君子分内。”<sup>③</sup>这可作为人文主义的辩护；然今人或可斥其为“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专事寻求上帝者，必不谓然。要之，王氏之解释，仍有可讨论之余地。

于此又有一问题当稍解释，这其实是属于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即“通相”与“别相”之辨。我们所讨论的，大抵属于通相，观大体，论一般。这么便以义理为中心，时代为依据。而个人亦在此

---

①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见《易》之“贲”。“文化”一名词，古义原出于此。

② 《读四书大全说》，释《孟子·滕文公下》。

③ 《读四书大全说》，释《孟子·滕文公下》之“则塞乎天地之间”句。